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环球瞭望

草根逆袭：英工党新领袖当选对政局的影响

□ 宋雄伟

2015年9月12日，66岁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以接近工党党内60%的得票率击败了其他三位实力派选手，成为英国工党的又一任领袖，其本人也被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左的领导者”。科尔宾的当选让世界为之震惊，他给英国政局近二十年来“中间路线”的左右之争注入了一股新的不确定性。

“新”工党思想的“溃败”

随着2015年5月7日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再次惨败，党魁爱德·米利班德宣布辞职，这标志着英国工党党魁位置的激烈角逐开始上演。科尔宾一直是工党北伊斯利顿地区（North Islington）的下议院代表，但从未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工党的权力中心场域。当科尔宾向媒体宣布角逐领袖位置时，所有工党的大佬们都认为这是一次陪练，仅仅是一个“极左”思想候选人的代表，不具有威胁性。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下，科尔宾成功地获得了36位工党下议院议员的集体签名（35位以上提名才有参选资格），与另外在影子内阁中担任重要位置的三位候选人竞选。然而，科尔宾出人意料的在第一轮中便获得了59.5%的绝对票数，毫无悬念地击败了其他三位候选人成为英国工党领袖。这一得票数甚至超过当年布莱尔当选为工党党魁的票数。

科尔宾的竞选过程实际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几乎所有的英国工党前政要都公开表示极力反对科尔宾成为工党领袖，包括布莱尔、布朗以及米利班德兄弟。然而，这些工党标志性人物的反对并没有动摇工党普通党员和支持者们的信念，而恰恰反映了“新”工党思想的溃败，他们需要新的领袖，新的尝试。甚至有的工党党员说，选谁都不会帮助工党赢得下一届大选，不如给科尔宾一个机会。可见，“新”工党思想的溃败是造成工党党内支持科尔宾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工党这个称谓源于1997年英国大选时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赢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完胜保守党而得名，正是因为大选的胜利，学者们将那时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策调整称之为“新”。这种“新”开始于金诺克的改革，鼎盛于布莱尔时期，延续于布朗时期，溃败在爱德·米利班德时期。其强调“公私混合经济，积极福利国家，政府与市场合作，以及个人责任”。然而，“新”工党思想的遗产让越来越多的工党党员觉得已经不再适合当下的时局。所以，当科尔宾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重新国有化，加大政府开支，政府大包大揽”的政策宣示口号时，这对于当下的工党普通党员们是十分受用的。因此，他成为新的英国工党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加激烈的“党内斗争”

工党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并不意味着科尔宾的首相之路就会一帆风顺（工党党员总数50多万人），事实上，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有70%以上的公众并不认为科尔宾是一位适合成为英国首相，代表英国利益的人选。曾经提名科尔宾参选的工党老政治家贝克（Margaret Beckett）对媒体公开表示十分懊恼提名了科尔宾，为工党的党内团结埋下了隐患。笔者以为，科尔宾突如其来的出现，可能会使工党的党内斗争更加激烈。这次选举揭示了工党内部在支持者结构和文化上的分裂，由老牌左翼斗士和自发、朴实、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组成的“新兴”力量，击败了“当权派”。虽然，在科尔宾当选后，爱德·米利班德等其他三位重量级候选人以及前副首相布雷斯科特对媒体公开表示了对科尔宾的支持，并督促工党党内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但这并不代表工党党内政治精英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调整和转变中，这些精英们也绝不允许工党忽然就转向“极左”，牺牲长久以来探索出来的政治道路。科尔宾目前虽然赢得了工党党内普通党员的信任和支持，但实际上真正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党内的政治精英们，科尔宾能否取得精英们的支持是衡量工党党内团结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然而，科尔宾当政还不足一个月，有不少迹象已然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会使工党党内的争执更加激烈。首先，工党党内的老一辈领导者不支持科尔宾，比如布莱尔和布朗等，他们的抵制力和影响力在工党内部仍然是巨大的，与他们站队的党内精英会在科尔宾的当政过程中形成强大的阻力和压力。布莱尔曾专门发表文章，抨击其政策是“爱丽斯梦游仙境”，大声疾呼“工党若选科尔宾做领袖，等于是自杀行为，不单会大选失败，甚至会有亡党危机”。其次，就在科尔宾宣布获胜后，工党“影子内阁”十余名成员立即提出辞职，比如，在国防问题上，科尔宾主张弃用核设施，负责国防事务的部长已经因为在国防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与科尔宾极为不同而提出辞职。再比如，在重新国有化的问题上，科尔宾主张将铁路、皇家邮政等公用事业完全国有化，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老路上，极大挑战了工党自20世纪90年代艰难转型后来之不易的成果，受到党内精英的一系列质疑。笔者以为，科尔宾将会面临来自工党党内强烈的抵制，甚至科尔宾能否将自己的党魁位置坚持到下一次大选都要完全取决于他今后的平衡和妥协能力。按照现行规定，工党党内只要有20%的议员代表提议，也就是只需要48名下议院议员的集体动议，便可以公开挑战科尔宾的党魁位置。

党争增添“街头政治”色彩

工党与保守党是英国政治中的两大政党，在近百年的英国历史中，一直是保守党与工党在轮流执政，随之出现的则是两大政党围绕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通过议会辩论、媒体宣传、执政绩效以及因选举政治而产生的偶然事件展开竞争，赢得选票，组阁执政。然而，近二十年来，即自布莱尔执政以来，历任执政党领袖基本上遵循了可预期的政治游戏规则，通过传统的方式展开党争，还没有谁像科尔宾一样，走到保守党大会的大门口亲自发表演讲，组织抗议，走上“街头政治”的道路。

10月1日晚上，科尔宾走上曼彻斯特大教堂前的演讲台上，向正在保守党年会上抗议的7000多名工会成员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讲话。这一行为实际上打破了英国政党党争的不成文规定，即当一个政党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年会时，另一政党的党魁不出现在这一城市。科尔宾草根逆袭，完全无视这一规矩，作为最大反对党的领袖出现在保守党年会召开地，参加街头抗争，反对保守党政府这些年的紧缩政策。无疑，因为科尔宾的特殊身份，使得保守党的年会开得极为扫兴，也激起了保守党的强烈不满。笔者以为，凭借科尔宾的“草根习气”，工党与保守党今后的党争会更多有“街头政治”的色彩出现，值得关注。

政策分歧渐趋扩大

科尔宾属于典型“极左”思想的奉行者，可以预期在他当政下，工党所推出的政策纲领必将会与“左”的路线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与保守党政策的鲜明对比。第一，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两大政党在政府是否应该以此为借口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上形成鲜明反差。保守党政府一直提倡紧缩，科尔宾则反对紧缩，认为政府应当投入更多给民生，比如继续增加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的公共开支。第二，科尔宾主张“税收公平”，对富人增税，认为“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应该交最多的税”，他还支持打击企业和富人的避税和逃税。而保守党政府则通过减税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激励企业家的积极性。第三，在对待政府定位和角色上，显然保守党政府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倡导社区自治、地区自治，而科尔宾的思路则是重新回到传统的工党思维模式上，让政府直接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突出政府直接干预的重要性。比如，对铁路重新国有化，直接提供公租房和其他基础服务设施，将医疗系统完全交由政府运行等。第四，在国际事务上，科尔宾坚决反对英国继续保留核武器、君主立宪制，并多次对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等表示同情。他认为英国应当考虑退出北约，希望英国减少军费开支，反对英国加入在叙利亚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时　评

“三观”不正 安倍政权“发难”国际正义

□ 侯　隽

2015年10月9日，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然而就是这样捍卫人类尊严、留住人类宝贵记忆遗产的正常之举却招致日本政府的反对与非议。反复无理要求中国撤回审议申请，并无端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缺乏中立性和公平性。另据日媒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于本月14日召开会议，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教科文组织继续提供经费，并拟于近日正式提交，要求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改革，“改善”相关评选制度。自9月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起，日本政府不断地与国际社会缠斗，先是对中国政府举办阅兵活动多次无端指责，继而又就潘基文秘书长本人出席中国阅兵军见的横加非议，如今又公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祭出“金援大棒”，不仅让人心生疑问，日本政府缘何如此“任性”，频频向国际社会“发难”，摆出一幅“死磕”的架势，故作委屈之态，归根结底是在于安倍政权的“三观”不正。

安倍本人的历史观扭曲。作为日本政府现任领导人，其所坚持的错误史观比比皆是，自其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在历史问题上不断背离国际社会期待。极力否认并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直接或者变相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拒绝明确承认《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背弃日本和平宪法，推动新安保法案通过，试图摆脱战后体制。这一切的荒唐行为都不是偶然的，是其扭曲历史观的真实体现，并不断地将其本人的价值观践行至其执政理念之中，试图使日本社会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安倍政权的“大国观”错位。日本政府为使得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多年来一直试图谋求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国地位，可以说在国际组织中是费尽心机，试图利用所谓的金援来换取日本的大国地位，然而每当受挫后便免不了牢骚满腹。日本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多年以来一直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认为缴纳了大笔的会费理应在联合国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将所谓世界大国地位赤裸裸地同金钱挂钩，此次又声言要冻结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所分担的经费，正是这种异常心理的再一次体现。日本寻求大国地位本无可厚非，但若一味地挑战国际社会共识，置国际公理于不顾，将历史问题当作日本的“负资产”而遮遮掩掩，难免沦为国际笑柄。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不是由其钱袋子决定的，而是应拿出十足的诚意取信于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看到日本政府的担当，一味坚持错位的“大国观”，只能适得其反。

安倍政权的价值观“跑偏”。安倍政权在对外交往中大力推广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张口闭口谈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但是在面对历史问题上的“欠账”时却又将这些理念抛至脑后，慰安妇、强征劳工、在华遗留化武等问题迟迟得不到应有的解决，对于日本自身因对外侵略所带来的种种惨祸却格外在意，长崎、广岛核爆、东京大轰炸、冲绳地面战斗等造成日本平民大量伤亡的惨祸广为世人所熟知，但日本却从未彻底反思战争责任问题，企图混淆视听，对因其侵略行为给中韩等亚洲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采取回避态度，国内与国外差别化对待，忽视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受害者长期的合理赔偿诉求，践踏被害者人权。此次日本针对南京大屠杀申请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阻挠行为是其这种错误的“价值观”的又一体现，在面对举世公认、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史实时，日本政府搬弄是非、避重就轻，不断纠缠所谓的遇难者人数问题，对待侵华历史缺乏真诚的悔罪表现。若是能够一视同仁，真诚面对历史，真正做到尊重人权，就不会有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战国际正义的荒唐举动。

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已经早有定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味歪曲历史，挑战国际良知的行为只能让日本失信于国际社会，企图通过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获得所谓的大国地位无异于缘木求鱼，只会让日本离“正常国家”目标渐行渐远。

世界经济

印度经济的光明与阴霾

□ 窦玉根　文　洋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整体复苏缓慢，地区间经济发展更不平衡。然而，此时南亚大陆上的印度以7.5%的增度超过中国的7%，成为2015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印度经济的整体向好，莫迪经济学功不可没。2014年5月，纳伦德拉·莫迪正式宣誓就任印度第十五任总理，其在古吉拉特邦的傲人政绩，令选民们相信他将成为印度经济未来的领路人。莫迪在古邦担任首席部长12年，其经济增长率居印度之首。莫迪所推行的重视市场经济，去官僚主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引进外部投资等措施，让这个只占印度5%人口的西部省份蓬勃发展起来，被誉为“印度的广东”。莫迪在担任总理之后，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他的经济发展思路，提出更深层次的改革规划，承诺要在“10年内使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

一年多来，莫迪新政逐步推进，改革步伐也逐渐加快。2015年的第一天，莫迪顶着反对党的压力，正式撤销已有65年历史的计划委员会，并用学术研究机构“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取而代之。莫迪认为，计委阻碍了印度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新机构则会以更加亲民和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印度的发展规划中来。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是早年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主要负责资金的分配，考核各部委和相关项目，研究跨部门项目等。虽然印度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但计委始终保持最高经济决策地位。莫迪在古邦执政时，当地计委甚至对其施政进行过干预，他对此十分不满。莫迪撤销国家计委，将其相关职能交给了印度财政部，这更表明其坚持市场经济建设、开放国内投资环境、改革本国经济体制的决心。

以“印度制造”引领经济发展。目前印度仍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工业配套落后、没有完整工业体系。同时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每年都有超过1000万劳动力加入就业大军。要消化这么庞大的劳动人口，只有通过发展制造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而新增的就业人口也将成为提高内需的重要力量，不断刺激印度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也给依赖能源进口的印度带来了良好机遇。莫迪甚至亲自为“印度制造”游说。他向到访过的国家一一发出邀请，甚至直接将“印度制造”写进与各国签订的合作备忘录里。印度政府也在积极地吸取其他制造业强国的经验，与日本和德国开展“投资者推广项目”，试图直接引进其先进经验和技术。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新型工业体系。印度制造，就要在印度设厂，而糟糕的基础设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莫迪渴望通过产业和基建领域的整合，打造集五大工业走廊于一体的工业型网络，使其成为助推印度工业加速增长的有效工具。德里—孟买、孟买—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清奈、阿姆利则—加尔各答和东海岸工业走廊形成围绕印度半岛的工业圆环，将100个智慧城市囊括其中，构成了印度今后制造业发展的新阵地。通过提供创业园区、廉价住房、打造数字中心等计划，给创业者提供更加友善的环境，促进就业和创新。同时物流产业也将随着铁路设施的更新提速得到良好的发展。未来，印度政府计划在对现有老旧的铁路进行提速，逐渐形成高铁网络，完成智慧城市为点，高铁网络为线，工业走廊为网的新一代工业基建体系。

大力引进外资成为印度产业规划的关键。与其他后发国家相似，资本的缺乏是印度无法回避的难题。虽然印度在过去二十年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但贫困问题仍然严重。借助外力成为莫迪经济学的法宝。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就之一就是重视外资的引进，依托当地的优惠政策和执行效率，吸引其他地区的外资进驻。当年塔塔公司苦于西孟邦当地农民反对征地而进退两难的时候，正是莫迪积极接洽成功将这个项目落到了自己麾下。莫迪上台后，继续积极寻求外资项目，通过多方外交成果，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各类投资计划。通过不断放宽外资直接进入限制和减少投资审批环节等方式，积极营造友好的投资环境。

然而，一切改革都会面对利益的纠葛。2015年9月2日，一场针对莫迪经济改革的大罢工在印度上演，说明改革对多方利益的触动之深。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天多达1.5亿工人参加了罢工，罢工人群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煤矿业的白领和产业工人。为什么高呼“印度制造”的莫迪经济学却得不到从业人员的支持呢？

原来印度政府计划对已经陷入困境的工厂实行破产来清理财政负担，关键的劳动法改革，将使劳工的雇佣和解聘更加灵活，减轻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限制，但已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



几十年的人们面对改革难以接受。劳工群体认为，政府的经济改革完全是对劳工的抛弃，亲资本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会让他们失去工作。工会组织认为，政府的改革和劳动法修订思路是想削弱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的作用和威信。如果通过了劳动法修订案，工会将会在未来失去劳工的支持和拥护，其下场只有自行解散。因此，大量工会甚至直接组织工人参与罢工，抗议政府改革。然而，现行劳动法对企业其实过于严苛，1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获得政府的同意才能裁员，而面对工会压力，政府又很难做出决定，多数企业不得不以较小的规模来维持运转，直接限制企业发展。

同时，高昂的土地收购价格和松散的联邦制政体也在客观的影响着外部投资和经济改革的落实。印度的购地费最高达土地市价2—4倍，而且必须事先取得70%以上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莫迪上台后一直试图对其进行修订，却在印度社会招致了巨大的反对声音。虽然执政党在议会下议院有着多数优势，但反对党已经在议会上议院展开攻势。若无和解方案，两党在议会的斗争将无限期的持续下去，这导致土地法的修订不知会拖到何时。

印度的联邦制政体在政策执行力上先天性不足。印度35个邦一级行政区中由人民党控制的不足三成，而主要政策的执行都依赖邦一级政府，中央政令不通，地方各自为政的情况已是顽疾。两党在各地区针锋相对，多个由国大党执政的地区更是难以渗透，莫迪的经济政策很难顺利推进。这种情况下，莫迪经济学的执行力受到各界质疑，加之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电力短缺、环境保护压力等因素交织，莫迪此前“50个月内完成所有改革”的承诺可能落空。

印度经济在过去一年多的良好表现，使印度各界对莫迪推进经济改革、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印度梦”给予希望。但与莫迪光辉相伴的制度阴霾却一直如影随形，未来印度的快速发展仅靠莫迪的个人威望与勤勉态度可能难以维系，能否摆脱官僚体制束缚、营造良好政治环境，打破固有利益藩篱，才是印度经济走向光明的根本所在。